

袁枚



SW 百花散文书系·古代部分

主 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袁枚散文选集/李梦生选注. —3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6

(百花散文书系. 古代部分)

ISBN 978—7—5306—5409—5

I. 袁... II. 李...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 2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630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插页 2 字数 161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19.00 元

编辑例言

一、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和诗歌一样,同是中国古代文学最主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优良传统,以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

二、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以抒情、记述体等文学性较强的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起自先秦,下迄于清代。按不同作家分别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演变轨迹。

三、本丛书每书分两部分:一为论文,内容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外,着重结合选入本书的作品,分析、评述其散文创作思想特别是艺术特色、散文创作发展历程及影响。一为散文,每篇均附加题解、注释。

四、论文部分力图与散文部分互补共济,以论文帮助

读者对所选散文提高到理性认识,又以所选散文来深化读者对论文的感性认识,两相印证,使本丛书除选注散文佳作供阅读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兼具作家论乃至古代散文史的作用,既不同于一般散文选本,也有异于一般的古代散文史而自具独有的特色。

五、每书所选散文,除了作者有代表性的名篇佳作外,还照顾到作者不同时期、不同题材、风格的文学性散文,以便体现作者散文创作发展道路。

六、题解除解释文题中有关词语、专门名词等和说明写作时间、出处、版本等外,还对作品写作背景、思想价值、艺术特色以至艺术手法等,加以简明的评述。

七、注释以疏解难字、难词以及典故、职官、器物、人名、地名等为主。对其重要者、用法特殊者,并援引出处或例句,以便读者不仅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百花文艺出版社

袁枚和他的散文

李梦生

一

清代乾隆盛世时,在南京的小仓山下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园林,名叫随园。这随园原名隋园,相传就是曹雪芹《红楼梦》中所写的大观园。不过,它在乾隆年间之所以闻名天下却与《红楼梦》无关,而在于它的主人——高踞诗坛文坛达数十年之久的袁枚。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晚年又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他生在一个诗礼之家,父袁滨、叔袁鸿均以游幕为生。幼有异禀,在祖母及孀居的姑母启迪教诲下,博览群书,声誉鹊起。十二岁中秀才,后又于敷文书院受业于名师杨绳武,发愤为文。乾隆元年(1736),袁枚二十一岁,南赴广西探望在广西巡抚金拱幕下供职的叔父,以《铜鼓赋》

受知于金鉉。正值朝廷诏举博学鸿词，金鉉遂以袁枚荐考。当时应征的博学硕儒二百多人，皆海内俊彦耆宿，以袁枚最为年轻。袁枚虽然考试落选，但从此名闻天下，奠定了他日后在文学界的声誉与地位。

在京时，袁枚与一些著名文人相互唱和切磋，学问日进，同时为功名计，潜心制艺，于乾隆三年（1738）考中举人，连榜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开始了仕宦生涯。但是好景不长，三年散馆，由于满文考试最下等，未能继续留在翰林院，外任江南知县。翰林院素称清贵之地，由此而循进，很快就能跻身卿贰。袁枚本以文章入翰林，忽被摈外，心中十分黯然，这直接撼动了他对仕宦的信心。袁枚在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知县，最后迁江宁知县。在任上，他严于律己，体察民情，敏而能断，是公认的清官。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对他很赏识，曾荐举他为高邮知州，部议未准。地方官做久了，擢迁无望，官场的腐败与永无止境的应酬更使袁枚迷惘和痛苦，不能做名宦退而做循吏的愿望也化作镜花水月。于是他急流勇退，买下了荒芜的小仓山下的隋园，加以修葺整治，改名随园，徜徉其中，埋头撰述，与诗友应酬，过起了寓公的生活。这一年，他才三十三岁。

袁枚辞官后，除乾隆十七年（1752）曾出山去陕西做官不到一年外，在随园差不多住了半个世纪。在此期间，他或往返于江浙，或出游名山，但主要精力是在随园送往迎来，结交权贵，与文人诗酒赓和，风雅迭倡。一方面，他广交诗人墨客，奖掖后进，热衷于声色口味之奉，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尹继善等人的嘘扬，他高

踞江南诗坛，执牛耳多年，倡导自己的诗歌创作理论，编《随园诗话》以吸引同调，被推为“当代龙门”（《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五《答和希斋大司空》附和希斋诗）。乾隆中后期著名诗人黄仲则《呈表筒斋太史》诗云：“一代才豪仰大贤，天公位置却天然。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又《岁暮怀人》云：“兴来词赋谐兼则，老去风情宦即家。”可以说是袁枚一生的写照。

袁枚既享高寿，又勤著述，所作极富，有《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九卷、《文集》三十五卷、《外集》八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小仓山房尺牍》十卷，另有文言小说《子不语》（一名《新齐谐》）及杂著《随园随笔》、《随园食单》等。姚鼐《袁随园墓志铭》云：“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故《随园诗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由于他广收门人，又创“性灵说”诗歌理论，与当时诗界奉行的“神韵”、“格调”说分疆鼎立，所以以诗名最盛，与蒋士铨、赵翼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三家之中，公推袁枚诗名为第一；而同时又以文名驰誉天下、自树一帜的，只有袁枚。

二

清代自康熙至乾隆，海内承平，文风炽盛。由于文字狱等影响，又由于颜、黄实学的提倡，文人转而偏攻经学，通儒硕士，接踵而起，文学与义理、考证之学从此便不能

结合得很完美。在学术上,学者又分为宋学派与汉学派。汉学派文人被冗钉繁琐的考据折磨了性灵,能文者很少,仅黄以周、戴震等人聊以点缀。宋学派能文的比较多,善于以实学驾驭文章的,如汪中、张惠言等,亦自成家;但大抵不重技巧章法,辞达而已,或偏重骈俪文。清以八股取士,文人多广涉书史,但往往博而不精,转以小品为工,讲究雅洁,著名作家如朱彝尊、王士禛、杭世骏等,莫不如此。有自己系统的文学理论、与经学家并峙相对而蔚成大国的是桐城派。

桐城派肇于方苞。方苞虽然亦尚宋学,但又提倡古文辞,明于呼应顿挫之法,讲究“义法”,力主叙事简便。同里刘大櫆继之,强调神气、音节交相为用。至第三代姚鼐,则进一步主张文章要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并重。姚鼐特选《古文辞类纂》,宣扬桐城派学说,奠定桐城选学,在《序目》中提出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条准则,使桐城派文艺理论更臻完善严密。姚鼐的理论得到了当时文学界广泛的承认,学古文者群起宗之,奉为领袖,桐城弟子遍布天下,流风馥郁,延续不替,直到清末,文人作文尚多恪守桐城家法。

在桐城派指麾天下时,能不随风气所移、卓然自成一家的,首推袁枚。

袁枚以排奥自矜,直抒胸臆,虽承明末公安余绪,但进行了自己的再理解与改造,使得文章在表现手法上丰富多彩,更为淳真地抒发感情,不像桐城派拘泥义法,往往流于空言。袁枚的散文理论散见于他的文章中,不如他的诗歌理论那么系统完整。但诗与散文本来只是形式

的不同,是一种思想的两种表现手法,正像姚鼐所说,“诗之与文,固是一理”,不过是“取径不同”而已(《惜抱轩文后集》卷三《与王铁夫书》)。因此,在探索袁枚散文成就和散文理论时,也就不妨引用他的诗歌理论以相互发明。

袁枚是清中叶思想最为解放的文学家之一。他在《所好轩记》中宣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在《秋夜杂诗》中,他也说自己“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可见,他热爱生活,追求生活中的个人享受。反映到文学上,他便认为作品要表现个性,男女之情是人之大欲,理所当然地可以在文学作品中表达出来。因此,对沈德潜《明诗别裁》不选王次回的歌体诗,袁枚大为不满,在《再与沈大宗伯书》中诘难道:“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这些思想,自然与当时社会上所奉行的程朱理学水火不容。同时,袁枚又鉴于经学家以考据为古文,把文学表现的范畴大为压缩,又不讲究文章的艺术,使得文章枯涩无味。于是他对经学家的攻击就不仅仅从思想上,也扩展到文学创作理论上。这种现象,是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

袁枚在《与程戴园书》中认为,古文的式微实肇于三误:“一误于南宋之理学,再误于前明之时文,三误于本朝之考据。”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对此三者进行批判。

首先,袁枚的行事与理学家所宣扬的伦理道德观念格格不入,所以他对经学家们释经表示不满,并由此进一步对六经抱怀疑态度。他在《遣兴》诗中就说自己“孔郑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在《答程戴园论

诗书》中云：

仆平生见解，有不同于流俗者。圣人若在，仆身虽贱，必求登其门；圣人已往，仆鬼虽馁，不愿厕其庙。

可见，他承认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思想精髓，但绝不愿意一成不变、不加鉴别地盲目信从，所以他对宋儒释经提出一系列质难。在《与程戴园书》中，袁枚公然说“宋儒非天也”，是可以怀疑并立异的。他指出宋儒多有伪性情，如吕希哲习静，其仆夫溺死不知；张魏公自言有心学，符离之战，杀人三十万，而夜卧甚酣：这都是大背孔子、周公之教的。在《读胡忠简公传》里，袁枚把朱熹与胡铨比较，认为朱熹空谈性命，无补于国家。袁枚对宋儒的指撻，最集中表现在《子不语》续集卷五《麒麟喊冤》篇中。故事在批驳了郑玄、孔颖达等汉学大儒学说中的不合理成分后，对宋儒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攻击，并描绘了这么一个场景：“苍圣带领宋儒上殿，有褒衣博冠、手执太极图者；有闭目指心、自称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号活泼泼地者。”通过这幅群丑图，对宋儒进行了刻薄的嘲讽和挖苦。袁枚还指出，宋学代传，至明颁行《四书大全》，“通行天下，捆缚聪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说，不读他书。杨升庵有言，虫有应声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应声者也”。

袁枚认为理学窒人欲，也限制了文学作品的自由发挥，因此，他对恪守宋儒思想的学者提倡文学主要为伦理教化服务的观点大不以为然，转而强调文学的美感功能。

如沈德潜选诗提倡诗的表现手法应该立足于温柔敦厚，他十分不满，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特地标举诗的“兴”、“观”、“群”、“怨”，即直截地表达人的各种感情的功用与之抗衡。

经学家步趋宋儒已是可笑，对他们及桐城派古文家以考据为文，充斥义理，使词章的功用退到不重要的地位，袁枚就更不能容忍了。袁枚认为，古文家似水，考据家似火；古文是作，考据是述，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他又认为，“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学形而下，各有资性，两者断不能兼”（《随园随笔序》）。在《与程葢园书》中，袁枚也这样说道：

古文之道形而上，纯以神行，虽多读书，不得妄有摭拾，韩、柳所言功苦，尽之矣。考据之学形而下，专引载籍，非博不详，非杂不备，辞达而已，无所为文，更无所为古也。

针对时弊，袁枚特地标举古文，文集中所收汰弃绮语、骈体、考据之文，把骈文另编为《外集》。他对古文的范围这样确定：“一切绮语、骈语、理学语、二氏语，尺牋、词、赋、诗、注疏、考据语，俱不可以相侵”，强调古文是“古人立言之谓也，能字字立于纸上，则古矣”（《与孙傭之秀才书》）。由此可见，除了骈文在文体上与散文有区别不能算古文外，凡作散文，必须“立于纸上”，即能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此外，袁枚还认为，八股文更不能滥列古文内，“古文者，自言其言；时文者，学人之言而而言”（《胡勿

厓时文序》),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八股文不过是宋儒的代言机器,“自时文兴,制称立,《大全》颁,遵之者贵,悖之者贱,然后束缚天下之耳目聪明,使如僧诵经、伶度曲而后止”(《答尹似村书》)。所以,八股文只能作为博取科第的敲门砖,一旦门敲开了,功名成就,便应完全摒弃。

袁枚论诗与论文虽不完全一致,但大致相通。他论诗提倡“性灵说”,这虽承继明末公安派文学观而来,又与清初王士禛的“神韵说”有相同之处;但虽同样出自性灵,袁枚却反对“神韵说”的朦胧,在抒发性灵的同时也刻意修辞,即注重艺术技巧。他又强调学殖识见对文章的作用,讥诮公安派的空泛圆熟。这种文学观,在论文上也是如此。袁枚在《钱珣沙先生诗序》中提出“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传巧不传拙”,把修辞与性情统一作为文章的标准。批评文章家沉溺于考证,“作为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笔平行,于剪裁、提挈、烹炼、顿挫诸法,大都懵然”(《与程戴园书》)。因此,袁枚虽然反复强调自己的散文是“古文”,是绍述汉魏,尤其是与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一脉相承,但在表现手法上,又以为文学只有工与拙的区别,没有古与今的区别。具体地说,是形式可以习古,内容却要更新,必须切合自己的现实情况,不能生搬硬套。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袁枚指出:“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天籁一日不断,则人籁一日不绝。”因而他提倡文章要真,把自己的真情实感直接反映出来;提倡个性,反对模拟,要自由地表现自己,要有我,“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着我?”(《续诗品》)

表现真我,即抒发性灵。真实的性情寓于生活,需要人们自己去深入体会,认真发掘。袁枚有一首《遣兴》诗可以说很形象地概括了他的写作方法。诗云:

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

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

诗不仅强调了艺术的源泉是生活,也指出重现生活要有艺术的灵感,“有所余于诗之外,故能有所立于诗之中”(《蒋心馀藏园诗序》)。

袁枚的诗文都以才情见长,这就完全以实际行动抵制了考据派以学问为文章主体的观点。不过,袁枚也不是否定学问,他读书之广、论学之精,从他的文章及《随园随笔》中均可见端倪。关键是,袁枚讲究学问是为了提高识见,学问为我用而不是我为学问用。在具体“用”上,又依文体的不同而不同。袁枚对散文与骈文都有很高的造诣,但他注意到“散行可蹈空”,易于落入空言舛陋;“骈文必征典”(《胡稚威骈体文序》),易于变成堆砌典章的刻板文字。所以他的散文以才情为矢的,长于布局气势,喜用素描;骈文则才情与学问相结合,词藻绮丽,用典切实。正由于袁枚善于相题视体,所以他能在各种文学体裁中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与辉煌的成就。

三

袁枚的思想及文艺理论,在他的各类散文中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因此他的散文作品充满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活力,不名一格而自成一格,不拘一体而自成一体。这在当时经学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界中,在桐城派占领袖地位的散文界中,不啻投下了一块巨石,虽然力量与气势有限,但掀起的震荡与波澜一时还是十分可观的。

袁枚的散文,从数量上来说,以写人物的碑铭传记占压倒多数。袁枚由翰林出身,喜以史笔自任,所作传记,出入《史记》、《汉书》,最为人所推重,上自王公大臣,下至细民节烈,都以得随园文为荣。《小仓山房文集》共计收文章五百三十多篇,其中碑传、墓志铭、行状、书事一类传记文就有一百五十多篇,内写九卿督抚以上的多达五十多篇。

传记类文章,有一定不变的章法,关键是作者的灵活运用,但必须做到能概括死者的一生功绩,扬善避恶。袁枚的传记文善于选材,如所写的人生平事迹十分丰富,他便能选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如所写者没有什么建树,他也能凿空而论,机杼旁运。袁枚还能紧紧把握住死者的身份,进行恰如其分的描述,褒奖而不流于空洞、涉于阿谀。在文笔上,也能做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如所写为达官贵人,即庄重严谨,如《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彭公神道碑》、《礼部尚书太子太傅杨公神道碑》等,莫不叙事简洁,句斟字酌,井井有序。而一些野老名士,如《江宁两校官传》、《范西屏墓志铭》等,则饱蕴潇洒闲逸之趣,重点刻画人物性格形象,发掘其高尚的思想品德。

感情丰富是袁枚传记文取得成功的一大关键,这点尤其突出表现在本应写得严肃端谨的神道碑、墓志铭及

行状之中。如《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神道碑》，碑主是他的恩师，因此在文中不时把自己的感情穿插进去，表达深厚的崇敬与感激，使文章自始至终沉浸着怅惘与伤感。又如《先妣章太孺人行状》，写的是自己的母亲，更是把母亲的慈爱与自己孺慕哀伤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书事、小传等文中，袁枚采取的手法与墓志铭、神道碑有所不同，往往只抓住一两件事发挥，突出人物的思想，塑造人物典型性格，文笔生动有致。如《厨者王小余传》，写王小余烹调一段：

其倚灶时，雀立不转目。釜中瞠也，呼张喻之，寂如无闻。映火者曰猛，则炆者如赤日；曰撤，则传薪者以递减；曰且醺蕴，则置之如弃；曰羹定，则侍者急以器受。

数语写出王小余烹调时全神贯注、指挥果断的生动场面，把他的技艺的高超直接表露出来。又如《书潘荆山》一文，极写其临危不乱，其中写运筹一段云：

事闻，……满公不知所为，登荆山床为诀，哭声乌乌。荆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贼即平矣。台湾贼皆乌合，何能为？第兵机贵速，须尽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荆山持笔，两侍儿供纸墨，群奴张灯听遣，足矣。”如其言。书一牒下中军曰：“发两标兵各千，五鼓集辕，旌旗、器械、战船缺者斩！”一牒下司、道曰：“运粮若干集厦门听取，误者军

法从事！”一牒下府、县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斩。各吏民安堵毋动。”荆山每书牒，笔飒飒如风雨。毕一纸，请公加印，印毕即发。未三鼓而部署定。荆山复解衣卧，台台大斲。

文章把潘荆山的勇敢果断、足智多谋、大度安闲的品质通过几百字集中表现了出来，如挟风雨而下，震撼人心。

其次，袁枚的书事、小传与墓志铭、神道碑在取材的侧重面上又不同。袁枚的传记文虽步武《史记》、《汉书》，但他注意到《史记》因虚构的地方太多而常遭人非议，所以取材很谨慎。如是墓志铭、神道碑及一些准备供国史采择的传文，多记政治、吏治等建树，堂正煌然；而小传、书事或记轶事的文章，就收入了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事件。这些文章把记人与记事融合在一起，注意场景的烘托，善于在情节的跌宕上下工夫，往往一波三折，委婉纡曲。如著名的《书鲁亮侪》一文，抓住鲁亮侪去中牟摘印的事，绘影绘声，写出他的忠肝义胆、豪犷不群，并以田文镜的刚愎威严、众官员的畏葸阿谀作衬托，使主要人物更为高大完美，明显取径于《史记》的《刺客列传》、《项羽本纪》。

袁枚的传记同时又直接规橐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紧扣人物的特点，虽常为事实所牵束，但能随事实而变格局，或略叙，或细写，或逆或顺，或旁衬，或特写，都能悉心筹划，营度得当。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常常以一定的篇幅记人记事，然后通过人物的言语、自己的感慨，再度完成对人物的塑造，寄托自己的思想。如《厨者王小余

传》，用大量篇幅写他的烹调理论及处世为人，把他的世界观与技艺提高到“有可治民者焉，有可治文者焉”的高度来认识，加深了文章的思想性。写人写事时言语不多，但生动活泼，使人如临其境；说理时精辟练达，容易使人产生共鸣。这些，都与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等文章异曲同工。袁枚还常常有意识地模仿韩、柳，如《石大夫传》就是学韩愈《毛颖传》的典型例子。

袁枚的祭文、悼词通常把人物的生平贯穿其中，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传记文的一种。他的哀悼文写得情真意切，出自肺腑。如著名的《祭妹文》，虽以琐碎细事连缀而成，但娓娓道来，自然感人，皆似血泪凝成，后人以为可以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泂冈阡表》鼎足而三。

袁枚提倡文章抒发性灵，即表达内心的感受，是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因此在他的游记一类文章中，最能体现他的文学观。

袁枚自称“好游”（《所好轩记》），他年轻时就喜欢游学，辞官后，每年要从南京返杭州一次。六十七岁时，遍游浙江天台、雁荡等名山，次年又游白岳、黄山。六十九岁时，南游江西庐山及广东、广西、湖南。七十一岁时游武夷山。直到七十七岁，还重游天台等地。名山大川的秀丽奇异使他深深地陶醉，写下了不少优美迷人的游记。

袁枚的游记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不拘一格，无迹可循，不像徐霞客等著名的游记作者的作品，几乎都是游览日记，依次将所见所闻摄入游记，犹如山志水经。袁枚是想到写什么便写什么，随心所欲，甚至于有意打破传统写法的藩篱。如《游黄龙山记》，具体描摹山的只不过是二十